

【文学研究】

“亞”字形图案形式母题的形成、演变及其文化意义

吴秋野

(暨南大学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甲骨文、金文、古代墓室和日晷、博弈棋局等文物中普遍存在的“亞”字形图形在原始文化中的具体含义, 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在史前文明中, 人们从太阳观测中得出“亞”字形观念以及“亞”字形由对大地之形的描述上升到精神性形式母题的过程, 透视出古代中国人特有的宇宙观和思维模式。而“亞”字形和古代礼制、“亞”字形变迁与中国古代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也正是这种宇宙观念和思维模式发展的具体体现, 其中蕴涵着中华文明的独特品格。“亞”字形在不同文化中的变异, 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探索各文化之间联系的可能性线索。而“亞”字形最终湮没在东方文明里, 却成为西方文明的神性象征, 从中可以总结出中西文化的差异。

【关键词】“亞”字形; “亞”字形大地; “亞”字形形式母题; 礼制形制; 崇中观念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8)02-0064-08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古代美术和文化史上, 有一个比龙凤图形更源远流长、更富有民族文化内涵的图形, 即古代青铜器铭文中常常出现的一个图形文字“亞”(𡗗)^①。

商代晚期, 亚字还往往跟氏族的名文相结合, 或成为氏族名文(有时候是图形化的氏族符号)的外框, 或在其内部, 也有的成为上部或旁边的偏旁。这一现象早在宋代就引起了学界的注意, 被称为“‘亞’字形”。北宋《博古图》卷一“商亞虎父丁鼎”下云: “铭四字, 亞形内著虎象。凡如此者皆为亞室, 而亞室者, 庙室也。庙之有室, 如左氏所谓宗祏, 而杜预以谓宗庙中藏

主石室是也。”这个说法是把“亞”字形当作古代宗庙建筑墙垣四周的平面图形, 这是宋以来诠释“亞”字形意义的主流。王国维在《明堂庙寝通考中》直接以“亞”字形来绘制明堂、宗庙、大寝、燕寝的平面图(后附图一), 提出古代明堂、宫室、宗庙通制于“亞”字形的观点^{②[1]}。

然而仅仅把“亞”字形解释为古代礼制建筑的象形图解, 显然是不够的。于是近代学者有的参考《书·酒诰》“唯亚唯服”和《诗经·载芣》“侯亚侯马”等古代文献中有亚字的词句, 转而主张金文与甲骨卜辞中的亚字与“亞”字形是指殷人身份的: 有的以为指爵号; 有的以为指武官职称; 有的以为指“一种特殊身份的标记”; 有的说是“有关祭祀之职称之标记”, 等等。

上世纪20年代, 殷墟被挖掘出来, “亞”字

【收稿日期】2007-09-12

【作者简介】吴秋野(1971—), 女, 暨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生。

① 龙凤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图腾形象, “亞”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形式母题。据王大有在《龙凤文化源流》中考察: 龙凤的规范化、定型化均不起于中原汉族, 而起于北方辽、金、元之契丹、女真、室韦蒙古等少数民族。对此拟另文论述。

② 然王国维所绘制明堂是由五个方块拼合而成的十字架形(𡗗)或中字形的, 而不是方形四角各缺一角或四角折入的“亞”字形建筑, 这种中字形或十字架形, 只是“亞”字形的一种变体。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论断, 这种中形符号是后于“亞”字形符号的。

形问题再次引起世人关注。出土的殷商王陵可分为东、西两区:西区发现 7 座“亞”字形大墓;东区发现 1 座“亞”字形墓、3 座“中”形墓、1 座“甲”形墓。此外,在靠近东区的大墓附近,还有少量的小型陪葬墓和为数极多的祭祀坑。西北岗大墓由于已遭严重盗扰,墓主无法确知,但可以肯定 8 座“亞”字形大墓皆为王墓,而 3 座“中”字形墓和 1 座“甲”字形墓则尚难断定。令人瞩目的还有:其后北京琉璃河镇黄土坡出土的西周燕国公墓地中,燕侯克之墓也是四角有墓道,底面为“亞”字形,此外还出土多座甲字型、长方形墓室。随后,“亞”字形、“中”形、“甲”形墓葬陆续出土,近来更探明阳陵等墓室的体制也都是“亞”字形的。显然,“亞”字形、“中”形、“甲”形等不同形制,是古人按墓主的身份等级严格划分的一种墓葬礼制制度。“亞”字形显然是最高等级的形制。因此有的学者直接把“亞”字形解释为帝王陵墓平面图^①。

上世纪八十年代,红山文化的积石冢陆续出土。这种石冢的典型形制就是居中设墓室的“亞”字形积石冢与圆形祭坛相组合(后附图二)。从牛梁河第五地点第 1 号冢中心大墓墓主手握双龟的情况来看,这个墓主不是帝王,而应该是掌管神权的巫师类的人物。这说明,在史前文明中,“亞”形观念已经存在,而且跟某种原始观念有关,“亞”形礼制只是这种观念在文明社会中的延伸。

李学勤、张光直先生都谈到在中国古代规矩镜、六博棋盘和石日晷上绘有 T、L、V 形纹各四个,李教授认为“TLV 纹是古人思想中的天宇框架”,“TLV 纹分布在四面八方,这是八极的象征”^{[2] 22-27},却忽略了铜镜、日晷、六博局盘的“八极纹”所隐含的“亞”字图形。张光直先生则注意到这一点,但在探讨“亞”字形的来源时,他没能从“亞”字形的文化内涵,以及它和它的变体与汉民族意识的形成、中国古代社会和国家起源的内在对应关系上做解释,而是认

为方形四角凹入是由于殷人在宗庙明堂四角植通天神木而成为“亞”字形^{[3] 363},这又有以西方社会经验观察中国先民思维和中国古代文化品格之嫌。

但张先生却提醒我们,看待“亞”形问题,必须从原始符号发生的角度、从“亞”字形与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的对应关系中考察这个问题,才能揭露其端倪。

二、太阳观测与“亞”形大地观念的形成

古人用肉眼来观察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太阳,在古人认识自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最初认识时间和空间,认识宇宙的运动,并能得出直观原始的宇宙观念,都与太阳观测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晋书·天文志》记录了蔡邕所总结的汉代以前的三种宇宙论:“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浑天。”其中盖天说出现最早,是中国先民直接从观察自然中得到的宇宙观,在发展过程中,它不断吸收其它学说的合理性,成为先秦时代影响最广泛的宇宙学说。

《晋书·天文志》中这样描述盖天说:“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隤,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以在六万里。北极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万里。外衡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天地隆高相从。日去地恒八万里。日丽天平转。分冬夏之间,日所行道为七衡六间。……又周髀家云:‘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通过这里的描述,可以知道,盖天说认为天穹是盖笠一样的形状,盖在大地上,像磨盘一样转动。天的周边与天顶、地的四方与中央,各有六万里的差度,天地相距八万里;而大地是方形的。《曾子·天圆》中又说:“天圆地方,则四角不掩”,那么这个大地的方形并不是个规则的

① 邹晓丽. 基础汉字形意释源[M].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0. 第 108 页:“‘亞’字形‘象征帝王所居住的四面开门的宫殿,表示眼观四方,耳听八隅,是最高礼制‘待遇’的形式之一,只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死后才能享用。……”

四方形,而是四角内敛的“亞”字形。

至于大地为什么是四角内敛的“亞”字形,没有文献对此做出解释,可当我们考虑到盖天说直接产生于对太阳和天象的观测,就可以理解这个问题。在简陋的环境中,古人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但随着季节的变换,升起的地点却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段南北距离里有规律地推移变化,这给古人一个错觉,即东方的大地边线不是无限的,而是在日出最北点和最南点之间一段有限的距离;同理,西方的大地边线也不是无限的,是日落的最北点和最南点之间的距离。人的思维有着对称的惯性,古人把对东、西大地边线的判断比照推延到南、北两个方向,认为这两个方向的大地边线也是有限的,因此大地的方形不是四边相扣的,而是像曾子所说“四角不掩”的“亞”字形。也就是说,古人观测太阳,得到了一种观念,即大地是“亞”字形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安徽含山县县长岗乡凌家滩新石器时代第四号墓出土的一件玉龟,充分说明古人天圆地方及大地是“亞”字形的宇宙观念。这件玉龟由背甲、腹甲两部分组成,出土时,背甲与腹甲之间夹了一块雕刻八卦图形的长方形玉版。背甲作椭圆穹隆形,腹甲呈四角内收的“亞”字形。背甲中部线刻着梭形背脊,把龟背分为左右两半;两侧加象征光芒的芒刺纹;而两侧的弧面上,都雕有表示日曦、月曦的弧线纹^[4]。这些花纹显然是在描述古人心中“天”的景象,它像盖子一样盖在大地上,那么“亞”字形的腹甲自然就是“大地”之“象”了。雕刻者显然是用这件玉雕来描述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宇宙观念。这说明古人的确是把大地看成是“亞”字形的。古人看到,龟的形象很符合天圆地方这种对天地形象的想象,因此认为龟是带着某种天意的神物,并用它的形象来雕刻宇宙的形式,并在背、腹间夹插八卦玉版,以表示天地之间有八卦。

而红山文化中的“亞”字形积石冢与圆形祭坛的结合也正是“天圆地方”的平面展现。

古人把大地看成是“亞”字形,这在文字学上也可以得到佐证,最直接之处就是在甲骨文和金文里,古人直接把大地画成“亞”字形,并

在氏族图腾、名姓外框画上“亞”字形,以表示这个氏族是大地的主人。同时“亞”字形大地的边线也就是天地相交的边线,“亞”又表示“天下”之意,金文中“帝王”这个符号,即被画成一个手持王杖、头带王冠,头上顶着“亞”字形的人,以示其为天子(后附图三)。卜辞中屡次出现的“多亚”、“多马、亚”等词即是说土地和牲畜的丰富。由于长期使用,“多亚”等词可能已经固定为最初的双声词汇,由其描写性指事引申出更深刻的含义,如“多亚”亦可以指联盟在一起的部族或邦国(早期国家),甲骨文中就有“王入于多亚”的句子。又因为“亞”字表示“我们所在的大地”、“土地”之意,所以也可以名词动化为征服土地的意思,《书·酒诰》“唯亚唯服”一句即取此意。我们现在还把我们的居住的大陆称为亚洲,也是这种原始观念的遗留。

三、原始思维与“亞”字形形式母题

西方很早就产生了纯时间与空间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了时间和空间范畴,并把它们作为客观存在,用时空单位加以度量。但在古代中国,时空观念却始终终而为一的。和原始人时空混一的情况不同,中国人是在原始神话的基础上,把时间、空间、季节、自然元素等按直观的原则加以系统化,最后形成了五行观念,把时间、季节、方位、色彩、方位神等诸多事物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事项群做统一的考虑。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人的思维观念是同构外联的。五行观中被组合成群的各种事项,就我们现在的思维来看,是看不出中间有什么联系的。但在古人看来,它们的结合却依附于“道”的规律,是神圣的。

但这里的同构外联并不是简单的象征。象征是线性思维的一种结果,它总是在问:“这一物象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中国古人并不追问事物的终极含义,而是要求事物符合天道的指示。老子说:“玄而又玄谓之道。”它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道不可言”的观念。换句话说,中国人早早地就下意识地认识到语言是有限的,而没

有形成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崇拜,更不会像西方那样,把构件语言的逻辑上升为世界秩序。在中国先人不顾及逻辑要求的思维中,萌生着中国文化独特的品格。总结中国原始思维的特点,我们至少可以说它是外延性的、散发性的、融合性的、向心的、寻求同构的。

随着科学水平的提高,“亞”形大地这一认识被渐渐改造,也逐步从中国人的文化观念里消失,以至于后人对此已经缺失了记忆。但在古时,“亞”形却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认为这是对大地之王的一种提示,既然主掌大地,就应该体现大地的自然之道,所以天子的居所要以“亞”字形为形,天子死后,依然要修筑“亞”字形的墓室,并在墓室上建造圆冢,以示天子居于天圆地方的宇宙中心。古人还基于这样的道理,把“亞”字形定为建筑和墓葬的最高礼制形制,并最终在文化流传中形成“亞”字形形式母题,深深地印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

人们不仅在天子墓室上使用它的形制,而且更广泛地应用在青铜铭文、祭器以及各种建筑配件中。虽然我们还没有确切发现呈“亞”字形的古代建筑,但在一些民间风俗中却可以找到这种建筑模式遗留下来的影子。比如在岭南和长江流域,民间建造房屋,还要在四角枕石,以表示辟邪之意。这是因为古人认为大地的“四角不掩”,因此四角就有不确切的、让人难以把握的意味,民间直接把它想象成邪恶、不吉祥的方位。盖房子震住四角,说明人们把居室和大地的“亞”字形直接联系在一起。

四、“亞”字形与礼乐制度:

从明堂看古代中国政治理想

从已有的古代典籍看,“亞”字形用于人世建筑,最早、最集中的表现当是“明堂”。

“明堂”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文公二年》所记晋人狼瞫的一段话:“目瞫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杜预注:“《周志》,《周书》也。明堂,祖庙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义之士不得升。”

《周书·明堂》记明堂之来由时说:“明堂者,明诸侯之尊卑也,古周公建焉,而朝诸侯于

明堂之位。”虽然不少古代礼书一致断定明堂制始于周,但也都同时肯定了明堂制前身的存在。其远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华夏文明起源的时代。在一些古代子书及传说中,明堂更同神话人物黄帝发生了联系。如《管子》说:“黄帝立明堂之议,舜有告善之旌,汤有总街之匡,武王有灵台之侯。”

许多文献描述过明堂的结构和功用。举其要者如《孟子·梁惠王下》“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如行王政,则勿毁之矣。”《大戴礼记》第六十七:“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总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所以朝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吕氏春秋·召类》“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以见节俭。”

不过,原始明堂并非后来文献所记那样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甚或更为复杂的庞大建筑群,而如《史记·封禅书》中所述“以茅盖屋”的四方形平台罢了:“上(指汉武帝)欲治明堂,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屋,屋通水,水环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面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

无论原始明堂,还是后世复杂化了的庞大建筑群,其建筑结构都是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哲学的显现。正如汉儒桓谭在其《新论》中所洞见:“王者造明堂,上圆下方,以象天地。为四面堂,各从其色,以仿四方。天称明,故曰明堂。”这和前述古代石日晷、规矩铜镜、六博棋盘所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是一脉相承的,此其一。其次,它们的平面图或堂基是“亞”字形。正如陈澧《东塾读书记》所说,明堂“堂基为‘亞’字形”。孙诒让《周礼·正义》亦说:“殷重屋四堂,盖为四出,若‘亞’字形,与周明堂制同。”近现代学者于此说更有所发挥,如唐兰说:“(亞)本象四室相对,中为庭守之形”^[5]。高鸿缙说:“‘亞’原象四向屋相连之形,乃古宫室之制也。前期金文著族徽者多囿以‘亞’字,‘亞’盖家族之‘家’之最初文也。”^{[6][116]}这也是殷人喜用龟作为占卜的工具,中国人视龟为神灵之物的原因所在,因为“龟甲是‘亞’字形,圆圆的穹形的背甲,四边有四足支撑着,这也正是宇

宙的模型。”^[7]¹⁰³

及至战国五行说出现,明堂制和五行说相互影响,天子居明堂的礼俗便升华为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了。诚如徐复观先生在《两汉思想史》中所说,在《吕氏春秋》以前的文献材料中记载的明堂和《吕氏春秋》之后的材料中所说的明堂,“虽有关联,但并非一物。前者是事实的存在,后者是理想的存在。”《通典》中描述的大大复杂化了的明堂建筑,就是典型的“理想的存在”。殷商之明堂周边厢房是天子居住之所,院中大厅是神庙兼议厅,后世明堂则演绎为古代中国国家政治、宗教、军事、外交、科学和教育中心了。叶舒宪在《中国神话哲学》中归纳它有 10 种用场^①,这么多的功能一处建筑难以承载,所以到了后来,它不得不解体了。

明堂作为一座“亞”字形实体建筑群,它虽然解体了,但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它则上升为一种“抽象的具体”——道,沉潜于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了。这就是《周书·大匡》所说“明堂所以明道”的意义。上升为“道”的“亞”字形不再是一种有形具体的礼制形式,而潜化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外化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明清的故宫,其太和殿的基座仍为“亞”字形;遍布中原大地的四合院,也是“亞”字形的典型显现。四合院正屋(堂屋)、东西厢房和进院门房正好组成一个规则的“亞”字图形。长辈居正房,子女居厢房,正是尊卑有序的礼乐制度的遗存,也反映了中国人的人伦观念。

“亞”字形融会在中国人的政治理想中,融会在日常生活的观念中,它像明堂一样,从具体的形式上消失,却以另一种方式,深深地渗透在中国文化中。

五、“亞”字形的演变:崇中与 社会形态演化的历史轨迹

在甲骨文里,有两种“亞”字形,一作“𠂔”

状,一作“𠂔”状,形态如中字。在金文里,亚字形的变化要丰富些,细分可为四种,“𠂔”、“𠂔”、“𠂔”、“𠂔”,大致上也是在“亞”字形和中形之间变化。金文中的“亚”,中间都有“点”或“横”。而这样的“点”、“横”显然是先民生活的抽象概括。在红山文化积石冢中,“亞”字形的中心是墓主人的墓室;在甘肃秦安大地湾大屋(F901)遗址中^②,其中心是圆形的“火塘”;到了《逸周书·作雒解》中,室中心则变作五行中与“土”相关联,代表国家领土、主权、命脉的社庙了。但无论是墓室、火塘还是神庙,都是总体建筑中最重要的具有神性力量的部分。正如《吕氏春秋·慎势篇》所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以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但随着天子权力的强化,宗庙、社稷的位置渐向两边移动,“亞”形的中心成了王的居所。贺业钜钩拟周王城基本结构^[8]²⁸⁻²⁹就属这种情形。也就是说,有周之时,宫室与神庙分离;再后,神庙中的祖庙又与社庙分离,崇中由祭祖、祭天地、五谷农神转而敬人,宗教泯灭了,居于大地之中的神性力量也渐渐式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人际关系跃居主导和统领地位,“亞”形中心的“点”、“横”即在这种转换、分解中悄然消失。这是“亞”字形的第一步演变。

“亞”形的第二步演变也与明堂礼制和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化密切相关。王国维所绘的明堂图,仅是殷周之际的明堂形制;因为在他的图像里,明堂已基本成了中字形,是“亞”字形的一种晚期变化。早期的明堂当是中间大室大庙远远大于四边建筑的“亞”字形,只是随着天子权力的集中,大室大庙越来越失去众人议事的功能,而渐渐成为天子权威的象征,自然也就不再需要那么大的面积,“亞”字形的明堂也就变成了中间越来越小的中形。

在古代中国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支配下,殷周之际的地上建筑明堂平面图与地下建筑墓室平面图都经历着由“亞”字形到中形的

① [9]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者总结明堂的十种功能是:天子发布政令之所在;天子祭祀先王及祖先的所在;天子“享上帝、礼鬼神”之所在;天子朝会诸侯之所在;天子“顺四时,行月令”之所在;天子“制礼作乐,行教化”之所在;天子设立国家“大学”之所在;天子“观四方”之所在;天子“养民以公”并“示节俭”之所在;天子封爵赏赐之所在。

② 这个遗址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约公元前 5000 年,有的学者认为它当是祭祀、聚会用的“原始礼制建筑”:明堂。

演化,这一演化过程又与中国社会于夏商周三代特别是东周春秋以后由公卿执政到中央集权制的转变相对应^①。

中国和西欧的古代社会都经过了由原始君主制到公卿执政的历史阶段。

在中国,夏商周三代都实行原始君主制。三代的君,多是各邦之君(称公,公与君,古时同音),邦君而成为诸邦联盟的首领,在周称王,亦即天下之天子。“雅典帝王和周天下,作为城邦联盟,其全盛时期的政治制度都是公卿执政制。”“古中国的公卿制,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公卿执政制,指主要当权者言。”^{[9]78 80}公卿执政制,其实是一种原始的贵族议会民主制。《礼记·明堂位》就是这一贵族诸侯议政的座次排列。城邦联盟,公卿议政,按尊卑排列座次,中间的大厅(太室)必须宽敞,所以,此时的明堂平面图自然就是一个中厅大、四面室屋小的“亞”字形了。夏商周三代千余年中,各国之君,梦寐以求的就是能作这城邦诸侯联盟的盟主而有天下。周公制礼作乐,目的之一即为加强和巩固周在这种城邦联盟中盟主的地位。在殷墟出土的历代殷商王陵中,西区七座大墓全为“亞”字形,就是这种生前的梦寐以求死后的展现。

及至周东迁以后,中国社会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先是东迁之后,天子失权,天下之盟主是霸者。而后诸侯亦失位,权落于大夫之手;然后家臣专政,国命甚至在陪臣之手。《礼记·明堂位》所描绘的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礼制图于是荡然无存。此即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

公卿执政时代,国君的主权本来就很有限。卿大夫们,在关系上是国君的宗亲昆弟,在身份

上与国君相去不过一肩。演变的极致是国君的地位被公卿乃至家臣凌夷不堪。鲁君到昭公时,已经四世不能掌握实权,昭公自己被逼出亡,老死客地。晋国被三家瓜分,晋侯反而必须向韩、赵、魏朝贡。卫献公流亡国外,同当权者谈判时提出的条件只是:“苟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战国时的各国,大都是这种强臣取代故主建立的。

鉴于此,在春秋局面即将闭幕的顷,新兴国家的统治者,非常注意把权力集中在一己之手中,将权威维持在绝对的高度。为了集权,战国各国君主争相采取措施,最常见的是“裁抑世族,扩张公权”。到战国时,世卿制逐步被消解,君主和卿相之间的血缘连带被建立在效率与忠诚之上的契约关系所代替。没有中间许多阶层的逐级分权,剩下的只是君主与被统治者两极,君主集权得以确立^②。


这时,“明堂”式的公卿议政已成为历史,宽敞的议政厅已不再需要。所以,现今出土的战国以后的陵墓,“亞”字形平面图已经不多,而更多的是能体现集中概念的“中”形或者“甲”形。事实上,集权首先是在局部地区的诸侯国、分封地发生的,然后扩大为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亞”形和“中”形作为不同的两个礼制等级长期共存,最终“中”形完全代替了“亞”形,这个过程和中央集权制代替原始贵族议政制度的过程是同步的。到了秦始皇成就统一大业,惟我独尊已到了连与皇后同寝都感到有失尊严,其陵园平面图更由“中”形变为一个显示天下权力集中于中央帝国的“回”字形了。殷商到战国王陵平面图从“亞”形到“中”形的演变,形象地显示出一种社会理念的破灭和另一

① 夏商周三代的祖先禹、契和后稷,都在帝尧、帝舜的朝廷里服务过,故夏商周都是自黄帝以来一直平行存在的三个氏族政治集团,至少,夏与商、商与周是在年代上平行(或重复)的两个政治集团,陈梦家曾“疑夏之十四世,即商之十四世”,是有道理的。这样一来,明堂制虽盛行于西周,而在殷墟和甲骨文里也大量存在着“亞”字形图,也就很好解释了。

② 瓦解封建宝塔,确立君主集权,更为关键和重要的是,世卿制的消解与君主关系质的演化。春秋之卿,若非中路病故,被杀或被逐,大多在职终身;世卿与国家休戚相关,君主既不能免他们的职,他们也不能辞职。战国的卿相既无一定的任期,也不是终身在职。而且来源庞杂,有时是异国公子,有时是周游列国的游士说客。这种新形态的卿相并不隶属于任何一国的社会,也因之不能构成传统的阶级。君臣若是合不来,不妨弃此他适,其关系逐渐发展为契约式或交易式的相互报施的关系。君以爵禄为货价,臣以能力为货品;臣若不能从国君得到货价,君也不用盼望臣子会尽力。有服务能力,却又可以随时罢黜;以俸禄换取服务,却可以免去占据封邑的弊病。在这种官僚体制中,效率与忠诚代替了无法约束和改变的亲属与血缘。于是春秋时政治上具有决定地位的强宗臣室几乎绝迹于战国后期政治。这是一个深刻的变革,它对君主专制的贡献意义重大。

种社会理念兴起的演化过程。

六、亞：人、鬼、神共居之所和 中国文化品格

“亞”不仅为中国雕刻、建筑图式所独有，在古代印度和拉丁美洲亦屡见。如墨西哥卡尔卡金哥遗址奥尔梅克文化石刻第 9 号张着大口的蛙形或兽形雕刻（后附图四），其蛙（兽）口就明显呈“亞”字形，这与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出土的“蛙形玉牌饰”（后附图五）极相似，只不过良渚玉牌饰的蛙口“亞”字形已收缩成为“”形罢了。至于“亞”形建筑，古代印度德奥加尔的毗湿奴（Vishnu）神庙平面图（后附图六），就极似中国的“明堂”与“四合院”，中庭或中室即是“四向”所拱卫的神圣中心；至今墨西哥山上 104 号 105 号墓地，还留有中国式的四合院式建筑；如此等等。

究其原因，盖从测视太阳升落轨迹得出一个“四角不掩”的“亞”字形，是全球各地古人共同的经验，而对于“亞”形的理解则随着各地人文和地理环境的差异而各不相同。奥尔梅克人认为兽形石刻张开的“亞”形大口，是天地的分界；古印度德奥加尔毗湿奴神庙的“亞”形代表着“天”或者“三界”即“天上——人间——地下”三元世界的通道。中国古人对“亞”形——人居其中的“大地”的理解则与中国文化泛神性的祭祖（人）与祭社（土地）并重，人、鬼、神共居^①的包容性、融合性与现实性直接相关。这一文化品格的生成与古代中国的地理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从地理上看，正如哈辛格（H·Hassinger）所揭示的，中国农业文化中心地是一个“面”状的河域，而不是“绿洲”式的点状区^{[10]175-176}。这个巨大的面，其内部有充裕的发展空间，四周又为险阻所隔离。它以河洛为中心，四通八达，“对周围既有吸引作用，又有辐射作用。它既有强大的吸收、包容、凝聚的力量，把周围的文化收纳过来；又有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出去、渗透出去、影响周围地区的力量。”在

五行学说所列的神位中，五帝的中心是“中央土”的黄帝，五神的中心是后土。在这里，原始神话的神灵终于归入了一个体系，而这个体系的中心就是人和土地。

和西方神话三分宇宙为天上、人间、地狱不同的是，在中国神话里，人、鬼、神是共居于大地之中的。而天上、人间、地下这三层世界也并没有价值判断上的含义。虽然后来的道教传说有了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的天上人间，但那个世界不过也仅仅是个皇宫模型而已。同样，中国神话中也没有一个丰富的地下世界。《说文解字》说：“人所归为鬼。”既然人之大归谓之鬼，地下的世界实际上也还是人的世界。而正是人、鬼、神以人为中心的平等地位，构成了中国文化一个重要品格，就是重现世，重人际。中国文化始终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不断地用世俗世界来改造外来宗教，让宗教服务于人，原因就在这里。这和上文所述的崇中观念，在社会结构的构造功能上达到了统一。在后世中国，正因为人权大于神权，才最终确立了“亚细亚社会”（马克思语）人的集权统治。

〔参考文献〕

- [1] 张光直. 青铜挥[C].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 [2] 李学勤. 比较考古学随笔[C]. 南宁: 广西师大出版社, 1997
- [3] 张光直. 青铜挥[C].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 [4] 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J]. 文物, 1989 (4).
- [5] 唐兰. 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铭考释[J]. (台北) 国学季刊, (4): 1
- [6] 高鸿缙. 中国字例[M]. 台湾: 广文书局, 1972
- [7] (英) 艾兰. 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M]. 汪涛,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 [8] 贺业钜. 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5
- [9] 日知. 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7
- [10] 哈辛格. 历史之地理基础[M]. 张星火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3

〔责任编辑 吴奕锜〕

① 在红山文化等史前文明的考古发现中，有多处在生人居室中修建亲人墓室的遗迹，这说明在先人的观念里，死去的亲人仍然和自己共居一处。

Key words European law; Financial services
General principles Freedom to provide services

**The Study on Exhibition Participation
Objectives of Visitors Factor
Analysis & Cluster Analysis**

——Case Study of Trade shows at Dongguan City

LUO Q iu-ju

*College of Tourism,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ontents & structures and categories of visitors' objectives in Dongguan when they participate exhibitions which is a vacant research area in China. This paper take 5 trade shows hosted at Dongguan city as case studies. Findings from survey of 3630 visitors indicate that attendee non-purchasing objective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purchasing objectives which support the previou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results. Specifically the structure of visitors' objective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four dimensions: information-searching, relation-building, incentive traveling and purchasing activity. Results also demonstrate that visitors of exhibition attending objectives have 3 categories: ambiguse objective ones, information-searching-oriented ones and multi-dimension-objective ones.

Key words Exhibitions Visitors Exhibition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Factor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The Excutive Incentive Con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Market Basis and
Accounting Basis Performance**

ZENG Fan-ying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makes deep analysis on the viewpoints that the managers' compensation's con-

tract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market achievement and accounting record, which has constructed an incentive compensation modal based on the increase in market value as the manager's achievement index. As a result, this modal is quite useful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earning manipulation brought by the manager's compensation merely depends on accounting record. Additionally, it avoids the troubling problem that the lack of effect brought by the manager's compensation's contract merely depends on market performance.

Key words executive incentive contract performance basis performance measure economic value added market value added

**The forming evolvement and cultural
meaning of the “亞” shape motif**

WU Q iu-y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What is the assured meaning of the “亞” shape graphics in the Chinese primordial culture which often appears in some cultural relics such as relic bone inscription, Jinwen characters, ancient graves, sundials, chessboards and so on? Scholars have no unitive cognition on this problem in prehistoric civilization. This treatise discusses how the ancients who lived in prehistorical culture elicited the concept of “亞” shape, and how the “亞” shape concept rose from the depiction of the shape of terra firma to a kind of psychic motif. From this discussion, the author summarized the unique universe view and ideology mode of ancient Chines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亞” shape concept and the ancient proprieties system, the change of “亞” shape and the transforming of Chinese ancient society just is the concrete embodi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universe view and ideology mode, among them contained the particular character of Chinese culture. The variations of the “亞” shape in different cultures offered us a

possible clue to explore the contact among various cultures. The “亞” shape finally disappeared in eastern culture while became a kind of deiform symbol in western culture; we can generaliz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from this phenomenon.

Key words The “亞” shape; the sun observation; the “亞” shape earth; the “亞” shape motif; the form criterion of proprieties system; idea of adoring center.

On Transmission and Acceptance of Shiji
through Art Deform of Each Dynasty

ZHANG Yu-chun, JIANG Ju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singing and dancing performance, talking art, asking and answering through acts and drama were four main forms to transmit Shiji. They were all between elegance and earthiness, and developed with times. Through performance, Shiji approached people's life, so its rational spirit was accepted by people, and edified people through instruction in amusement.

Key words Shiji; arts perform; transmission and acceptance.

On Postmodern Carnival
Carnivalization in *Closing Time*

WANG Zu-yo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4 China

Abstract Carnivalization, one of Mikhail Bakhtin's key concepts, means *polyphony*; the centrifugal force of language; the *gay interdependence* of things; perspectivism and performance; participation in the wild disorder of life; the immanence of laughter. Carnivalization in *Closing Time* covers a wide range from the convoking and confusing con-

ference of ACACAMMA to Milo Minderbinder's stealth bomber; from disordered metropolitan living to a socialite wedding in the bus terminal. *Closing Time* illustrates carnivalization as an anti-system, a second life standing for postmodernism itself.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Closing Time* on three levels: the carnivalization of world experience; the carnivalization of art thought; and the carnivalization of literary genres.

Key words carnivalization; the feel of carnivalization world; the carnivalization of art thought; the carnivalization of literary genres.

Contemporary Poetry on Debating
A Review of Controversy about
Poetr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ZHOU Zhi-qiang, JIANG Shu-zhuo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narration of contemporary poetry,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would be Menglong poetry, the Third Generation poetry and the poetry of 1990s. But it was paradoxical that in their most active period, they were actually placed at the edg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because of various reasons and criticism by many people. And it was more surprised that the more differences and contradictions had in themselves, the more stable their place in poetry history would be. This paper reviewed has several poetry controversy and would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e reflection on contemporary poetry and criticism.

Key words Menglong Poetry; the Third Generation; the Poetry of 1990s; Controversy.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Action Classifier *Bian* (遍)

ZHOU Ju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